

學生姓名： <<\* 禰駿遠 \*>>  
學生編號： <<\* 1010160800 \*>>  
課程講師： 鄭會欣 教授  
科目： HIST5568  
日期： 2016 年 3 月 30 日

## 黑色的金融：

### 杜月笙的銀行家生涯及在 1935 年貨幣改革所扮演的角色

銀行家一般都給人們一個高尚及端莊的形象。然而細看民國歷史，會發現原來黑社會大頭目杜月笙也曾經馳騁於金融界。因為民國時期中央政府權力薄弱與西方列強皆於沿海地區霸佔和劃分租界，非正常的勢力重心如黑社會集團便因時勢而壯大起來。杜月笙就在這個大時代背景在最繁榮的上海裏面成爲最有影響力的青幫頭目。

清末民初之際，國家資本市場開始興起，現代銀行業亦在同時應運而生成爲經濟所不能或缺的資本流通渠道。因為金融業在國家經濟和政治所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歷史上很少政權會允許如青幫那樣的組織或其頭目走到銀行界的前頭。但基於民國時期的種種原因，杜月笙成爲上海金融界的領袖。最爲突出的是，杜氏在 1935 年以青幫一貫的辦事作風爲中央政府推行改革中國沿用了 500 年的白銀貨幣制度，讓政府可以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發行鈔票。杜氏因其的貢獻而名利雙收。國家亦因爲這個制度在期後的 14 年（1935-1949）陷入了 20 世紀世界上極爲毀滅性的通貨膨脹。

這篇論文會分爲以下部份：第一部份會講述杜氏如何發跡並成爲上海青幫的重要頭目。第二部份會探討杜氏打進金融行業的經過。第三部份會描述 1935 貨幣改革的背景。第四部份會講述杜氏在金融改革所扮演的角色。第五部份爲總結。

#### 杜氏發跡

清政府在 1842 敗給英國後，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其中的條款就是五口通商。五口之中的上海很快就因爲它處在中國最繁榮的江浙地區而迅速發展成爲中國最發達的城市。在西洋航運的影響下，上海開埠不久的 1853 年，漕糧開始變成“海運後，幾千

條漕船上的水手同河岸繙夫，搬運工人及集鎮商販等數十，百萬人陷入失業絕境。”<sup>1</sup> 在沒有政府和社會能提供生活保障的情況下，他們紛紛加入了在上海很有勢力的非官方組織來保護自己及為未來謀出一條生路。“這些人中間影響頗大的祕密組織-青幫，遂成為黑社會勢力的重要組織形式。”<sup>2</sup>

與此同時，上海市在清末到民初的時期是被英，美，法，日幾大列強所分割和霸佔，各自設立租界，所以這個城市是“沒有統一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行政管轄機構。”<sup>3</sup> 社會治安亦因為這個原因而變得難以維持：比如“兩個租界的巡捕（是）互不相謀（的）。”<sup>4</sup> 因為上海並非列強的本土，所以他們政府的政策都是以如何在當地謀取最大的利益為出發點而不是為當地本土人民的福祉為目標。就是這個原因，“租界當局，對鴉片煙，賭博，娼妓等”行業皆使用“縱容與扶植”的政策。<sup>5</sup> 在 1865 年公董局“三分之二的收入”<sup>6</sup> 來自賭稅。

就在這個時代和地理背景，杜月笙在 1888 年生於上海川沙縣。<sup>7</sup> 杜氏早年的生活艱苦，家境不好。他“父母早亡，由舅父收養，童年就染上賭博惡習；15 歲時到上海，在十六鋪的一家水果行中當學徒。”<sup>8</sup> 與其他沒有教育，家世和貧窮的環境下，杜氏終於加入了幫會，並“拜陳世昌為老頭子，列青幫“悟”字輩。”<sup>9</sup> 後來杜有機會到上海黑社會頭目黃金榮公館並“受到黃妻青睞，被不次提握，由替黃金榮拿大一皮包，向花煙間，燕子窩，煙臺收月規錢，遂漸上升主持鴉片提運，成為黃的親信助手。”<sup>10</sup> 在北洋時期，中國政府和外國在華勢力都共同的用鴉片來謀取各自的利益，所以毒品的市場迅速的蓬勃起來。煙土商遇到發財的機會，加大推銷他們的鴉片。數量增加了就不免碰到運輸的問題，他們“為確保（貨品）安全，紛紛以重金委託一些大的流氓團伙保價承運。”<sup>11</sup> 在“1917 至 1918 年，黃金榮團伙開始”<sup>12</sup> 進入這門生意。<sup>13</sup> 杜月

---

<sup>1</sup> 朱華、蘇智良：〈杜月笙其人〉，《歷史研究》，1988 年 2 期，頁 102。

<sup>2</sup> 同上。

<sup>3</sup> 同上。

<sup>4</sup> 同上。

<sup>5</sup> 同上。

<sup>6</sup> (法) 梅朋·傅立德，倪靜蘭譯：《上海法租界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年)，頁 370。

<sup>7</sup> 同注 1，朱華、蘇智良：〈杜月笙其人〉，頁 103。

<sup>8</sup> 同上。

<sup>9</sup> 同上。

<sup>10</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社會問題組：《大流氓杜月笙》(北京：群眾出版社，1965 年)，頁 5-7；  
惲逸群：〈杜月笙論〉，載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惲逸群文集》編選組編：《惲逸群文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160-163。

<sup>11</sup> 同注 1，朱華、蘇智良：〈杜月笙其人〉，頁 104。

<sup>12</sup> 同上。

笙憑着個人的機智和平時與別人相處的手腕贏得了黃金榮的垂青，在選擇由誰來管理這個盈利豐厚的生意時，“黃挑中（了杜氏來）主持這一活動。”<sup>14</sup>

杜氏不負黃金榮的重託，在短時間內就把運輸鴉片的生意搞得有聲有色。杜月笙最厲害的地方就是聯合社會不同利益集團和勢力共同在運輸鴉片的過程中發財。在史料裏面可以看到，當時“提運集團的有中國武人，警官，文官，查煙員及租借巡捕與流氓等。”<sup>15</sup>運輸鴉片是不能只靠着底層官員的，杜月笙亦拉攏了另一位青幫頭目張嘯林，靠着“張的軍閥關係”<sup>16</sup>來確保鴉片在運輸過程中不被北洋當局阻擾並得到他們的保護。發展幾年後，杜氏的機構基本控制了市場，並於“1925年七月，（他）在租界與軍閥當局的半公開保護下，成立壟斷法租界煙土提運的【三鑫公司】。”<sup>17</sup>

三鑫公司的三位老闆分別為黃金榮，張嘯林和杜月笙。三位的老大為黃金榮，但他並非青幫份子。<sup>18</sup>張嘯林為“通”字輩，備份比杜月笙高，但二人卻以兄弟相稱。<sup>19</sup>可以看得出，杜氏為三位最為年輕和備份最低的，但他憑着個人的魅力和能幹成為上海青幫裏面舉足輕重的頭目。

1927年，蔣介石的國民軍在初階段勝利而其勢力亦開始蔓延到上海。蔣氏跟黃杜二人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很早。“蔣的親信王伯齡，楊虎也很早就和黃金榮，杜月笙稔熟。”<sup>20</sup>同年的四月，杜月笙，黃金榮和張嘯林“參加412政變，協助（國民黨）捕殺共產黨人，鎮壓工潮。”<sup>21</sup>因為這個功勞，杜，黃，張被任命為“總司令部少將參議，行政院參議。”<sup>22</sup>在此背景下，杜氏和國民政府就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而這個就奠定了後來杜氏成為銀行界的領袖和參與1935貨幣改革的基礎。

## 杜氏成銀行家

運輸鴉片生意的好景不長，在“1931年法國撤換了駐滬總領事和警務處總監，並開始整頓租界煙賭糜爛現象。”<sup>23</sup>與此同時，“杜月笙被免去華董一職，並被要求

---

<sup>13</sup> 同注 1，朱華、蘇智良：〈杜月笙其人〉，頁 104。

<sup>14</sup> 同上。

<sup>15</sup> 同上。

<sup>16</sup> 同上。

<sup>17</sup> 同上。

<sup>18</sup> 同上。

<sup>19</sup> 同注 1，朱華、蘇智良：〈杜月笙其人〉，頁 105。

<sup>20</sup> 同注 1，朱華、蘇智良：〈杜月笙其人〉，頁 106。

<sup>21</sup> 同上。

<sup>22</sup> 同上。

<sup>23</sup> 包樹芳：〈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3期，頁 106。

撤走在法租界的賭場和鴉片館。”<sup>24</sup> 在這件事之前，杜氏已體會到鴉片生意不可能是永久的做下去。杜氏便尋找着可行的出路。有學者認為，“幫會成員進入合法行業，不自杜月笙始，但在杜月笙手中逐漸發達起來，”<sup>25</sup> 並走向頂峯期。杜氏最終選擇了銀行業為他的重要發展路線。

銀行業是講求信譽的，所以社會一般會視銀行家們為正當的商人，而他們亦會為了自己的聲譽和幫會人士保持距離。比如，當時的“銀行界另一巨頭陳光甫（就）對幫會勢力，原來也是抱適當敷衍的態度。”<sup>26</sup> 但是隨後發生的事讓幫會和銀行界走得很近。有一次，個幫會偷了上海銀行在濟南所庫存的 2000 餘擔棉花。陳光甫通過青幫頭子張仁奎的協助找回這批貨物。從此“陳光甫和張仁奎換了帖子，成為異性兄弟。”<sup>27</sup> 這個事情可以看出因為當時的政府比較弱勢，商家很多時候需要非政府而具備武裝力量的幫會幫助和保護他們。這個無形讓幫會和合法行業在大環境的驅使下走在一起。

就在 1929 年，杜月笙創辦了自己的中匯銀行。杜氏自己也曾經說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規規矩矩辦的事業。”<sup>28</sup> 他也因為成為銀行的老闆而改變了自己的生活習慣。有記載，“中匯銀行開設後，他在社會的活動越來越頻繁，每天總在上午九時前起身，鴉片也不多抽了。”<sup>29</sup> 當時在上海的人們都會這樣描述黑幫的三大亨：“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sup>30</sup>

中匯銀行開業兩年後發生的事給了杜月笙提升自己在銀行界地位的契機。

“1931 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一艘運鹽船在長江翻船。”<sup>31</sup> 市場上普遍認為上海銀行會因為這個事情而陷入財困，故此“僅三天時間，上海銀行的庫存就虧空了一半。”<sup>32</sup> 杜月笙看準了機會就從自己的“中匯銀行提存 100 萬，讓煙賭大亨籌資 200 萬。”<sup>33</sup>

---

<sup>24</sup> 同上。

<sup>25</sup> 胡訓珉、賀建：《上海幫會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160。

<sup>26</sup> 同注 21，包樹芳：〈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頁 107。

<sup>27</sup> 蔡墨屏、潘泰封：《陳光甫的思想和企業簡析》，吳經硯編：《陳光甫與上海銀行》，頁 163；轉引自注 21，包樹芳：〈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頁 108。

<sup>28</sup> 章君毅著，陸京士校訂：《杜月笙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年-1969 年）；轉引自注 21，包樹芳：〈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頁 107。

<sup>29</sup> 郁詠馥：〈我所知道的杜月笙〉，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54 輯，舊上海的幫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273。

<sup>30</sup> 同注 21，包樹芳：〈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頁 108。

<sup>31</sup> 胡雪蓮：〈杜月笙與中國通商銀行〉，《中山大學研究學刊（社會科學版）》，20 卷 4 期（1999 年），頁 61。

<sup>32</sup> 同上。

<sup>33</sup> 章君毅著，陸京士校訂：《杜月笙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年-1969 年）；轉引自注 21，包樹芳：〈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頁 109。

不僅如此，“至於上海各行各業，係由杜月笙出面代打招呼。不二日，風平浪靜，存款反而遂漸增加。”<sup>34</sup>從此陳光甫便成爲杜氏的摯友並在杜氏想攀登社會上流時給予了支持。

這件事情可以反映到杜氏待人處世的手腕。和杜氏稔熟的范紹增回憶道：

“別人有事要找他幫忙，只要以後能從這人身上找回本錢，他總會是很痛快地答應下來，暫時賠點錢，他也肯幹。他常常向我談什麼要從遠處着眼，不要只看眼前，所以等到他要去利用別人時，也往往能夠順手。他善於揣摩別人心意，能根據不同類型性格的人，運用不同的手法對待，是一些人和他見面後，總愛與他交往。”<sup>35</sup>

另外一位和杜氏交深的銀行家爲錢永銘。他爲當時上海金融界舉足輕重的人士，曾任上海銀行公會會長及交通銀行協辦。錢早年對幫會人士有看法，但後來成爲杜月笙的摯友。當時上海市的人都知道“杜推錢爲老大哥，錢稱杜爲有肝膽，有俠氣，夠得上的知友。”<sup>36</sup>後來，銀行界名人如錢新之和陳光甫都是中匯銀行的董事。徐寄廎曾任中央銀行代總裁。他和杜氏都是當時上海市商會的常務理事，“兩人交情頗深。”<sup>37</sup>布賴恩·馬丁在【上海青幫】研究中提到，1932後，“杜月笙被國民黨政府所吸收，成了新的階級合作主義體制在上海運行的一個重要因素。”<sup>38</sup>杜月笙“做商會會董，工業總會理事長，平步青雲，都由交納自命爲金融領袖所致。”<sup>39</sup>到1935，杜月笙已經在上海合法的金融界和幫會有着不能代替的領導地位，這個就成了他贏取了參與貨幣改革的資格。

## **1935 中國貨幣改革**

1935年，中國面臨着嚴重的通縮危機，直接影響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要瞭解當時的情況，就必須清楚中國的近代貨幣制度進程。“自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至1935年11月法幣改革廢止白銀貨幣止，中國以白銀爲基礎的貨幣系統實行了整整500

---

<sup>34</sup> 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第5冊，經濟金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51。

<sup>35</sup> 范紹增口述，沈醉整理：〈關於杜月笙〉，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4輯，舊上海的幫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99。

<sup>36</sup> 潘仰堯：〈錢永銘其人〉，載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第5冊，經濟金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82。

<sup>37</sup> 郭旭：〈杜月笙與戴笠及軍統的關係〉，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4輯，舊上海的幫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73。

<sup>38</sup> (澳)布賴恩·馬丁著，周育民等譯：《上海青幫》(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頁205。

<sup>39</sup> 同注34。

年。”<sup>40</sup> 在工業革命前，中國的絲綢，陶瓷和茶葉都是世界所稱頌而追求的。世界各國就用白銀來換取他們所需要的中國貨品，故此從“1600 到 1800 年中國獲得了有記錄世界白銀產量的 50%，大約 60,000 噸。”<sup>41</sup>

隨着工業革命和殖民地時代的來臨，以英國為首的大部份發達國家都從 1870 年開始採用了金本位貨幣制度，那就是它們的貨幣價格是與黃金價格所掛鉤的。但同時就標誌着“白銀成爲國際商品，其價格主要是由倫敦市場，紐約市場和上海市場決定的。”<sup>42</sup> 中國當時沒有跟隨着國際實行金本位，而仍舊把貨幣與白銀掛鉤。正因這樣，“中國的白銀貨幣體系實際上奉行的是（跟其他貨幣）浮動匯率制。”<sup>43</sup> 1929 年發生了全球大蕭條，很多發達國家都因爲通縮而面臨經濟和金融危機，但“因爲銀價相對金本位貨幣嚴重下降，使中國避免了大蕭條最初兩年的貨幣衝擊。”<sup>44</sup> 1929-1931 年國際銀價大幅下跌而造成上海的銀價比其他金融中心爲高，所以白銀大量流入中國，讓中國逃離通縮的命運。

到 1931 年 9 月 19 日，在大量銀行倒閉的壓力下，“英國退出金本位，這就使國際銀價止跌。”<sup>45</sup> 1933 年，美國羅斯福總統上任後，“宣佈美國放棄金本位，目的在於，實行無拘束之通貨膨脹政策。”<sup>46</sup> 美國離開金本位需要尋求另外的貨幣制度，而他們開始對白銀產生興趣。1933 年 6 月，“65 國參加的倫敦會議召開，會議達成 8 國【白銀協定】，美國為此協定的始作俑者，加拿大、秘魯、墨西哥、澳大利亞、中國、西班牙、印度等 7 個產銀、用銀大國大國表示贊同。”<sup>47</sup> 這個“協定的目的在於提高銀價，限制生產。”<sup>48</sup> “美國的白銀立場基本上反映了白銀派政客的意見。”<sup>49</sup> 白銀生產爲當時美國七個州的經濟支柱。代表它們的國會議員不停地在國內外運作，謀求更高的白銀價格，從中獲利。這些議員最終取得成功：“1934 年 6 月 11 日，美國參議院通過【購銀法案】，要求將國家貨幣儲備與黃金提高到 1/3。”<sup>50</sup> 白銀協定收緊產

---

<sup>40</sup> 周子衡：〈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對中國貨幣經濟的沖擊—1933-1948 年中國貨幣經濟的現代轉型、失敗及其遺產〉，《金融評論》，2012 年 4 期，頁 30。

<sup>41</sup> Ward Barrett, “World bullion flows, 1450-1800”, in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 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ed. James D. T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4-254.

<sup>42</sup> 同注 40，周子衡：〈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對中國貨幣經濟的沖擊〉，頁 32。

<sup>43</sup> 同上。

<sup>44</sup> 同上。

<sup>45</sup> 同上。

<sup>46</sup> 宋斐如：〈世界經濟現狀及其將來〉，《東方雜誌》，31 卷 11 期(1934 年 6 月)，頁 32。

<sup>47</sup> 同注 40，周子衡：〈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對中國貨幣經濟的沖擊〉，頁 33。

<sup>48</sup> 同上。

<sup>49</sup> 同上。

<sup>50</sup> 同注 40，周子衡：〈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對中國貨幣經濟的沖擊〉，頁 34。

量和美國當局為充實白銀的儲備而大量買入讓白銀的價格大幅上升。1932 年銀價為每盎司 0.27 美元，上升到 1935 年 7 月的 0.7437 美元。<sup>51</sup>

儘管美國議員可能沒有惡意的打壓中國的經濟，但是“國際銀價的快速上升導致不可遏制的大量白銀外流，從而直接損害中國貨幣穩定。”<sup>52</sup> 隨着白銀價格上升，讓與其掛鉤的中國銀元亦跟隨升值，這就領到“貿易入超嚴重，輸出困難。”<sup>53</sup> 國際銀價上漲領白銀大量流出中國，白銀進出口量由 1929-1931 的正數到 1934 年的出口 1.64 億關兩，1935 年出口的 0.38 億關兩到 1936 年出口的 1.6 億關兩。（見表 1）大量的白銀外流讓貨幣供應量大幅減少而引起利息的飆升。在白銀上升的環境下，1934 年“錢莊年利息自 6% 提升到 16% 以上。”<sup>54</sup> 通縮經濟讓實業難以經營。“1934 年上海工商業改組 1290 家，歇業 366 家，1935 年上半年，改組 931 家，歇業 250 家，下半年的中秋節前後 9 天倒閉 166 家。”<sup>55</sup>

表 1 - 中國 1929-1936 年貿易相關的數據<sup>56</sup>

年份	外匯指數 (1926 年 = 100)	銀價指數 (1926 年 = 100)	白銀的淨出口或 淨進口 (1000 關兩)	以國幣計值的貿易額 (100 萬元)	
				進口	出口
1929	85.9	85.4	+105,826	1620	1070
1930	59.5	61.7	+67,006	1723	944
1931	45	46.5	+45,445	2002	915
1932	55.8	45.2	-6,672	1524	569
1933	62.7	56.1	-9,257	1345	612
1934	73.5	77.4	-164,780	1030	535
1935	82	103.5	-38,124	919	576
1936	65	72.8	-160,220	941	706

國際白銀價格的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為美國的貨幣而白銀購買政策。中國方面就這個問題多次與美國交涉，希望美方可以舒緩白銀升幅的速度，但羅斯福（總統）“並不願意立刻改變白銀政策。”<sup>57</sup> 國民政府未能得到美國的協助就只能在國能推行刺激經濟和停止白銀外流的政策。在 1934 年 10 月 15 日，國民政府開始“徵（白銀）

<sup>51</sup> 同上。

<sup>52</sup> 同注 40，周子衡：〈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對中國貨幣經濟的沖擊〉，頁 33。

<sup>53</sup> 同注 40，周子衡：〈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對中國貨幣經濟的沖擊〉，頁 34。

<sup>54</sup> 同注 40，周子衡：〈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對中國貨幣經濟的沖擊〉，頁 35。

<sup>55</sup> 同上。

<sup>56</sup> 管漢暉：〈20 世紀 30 年代大蕭條中的中國宏觀經濟〉，《經濟研究》2007 年 2 期，頁 18。資料來源（全部轉引自管漢暉：〈20 世紀 30 年代大蕭條中的中國宏觀經濟〉）；鄭友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 1840-1948 年：史實的綜合分析》（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 年）；阿瑟·楊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國財政經濟狀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sup>57</sup> 同上。

出口稅和平衡稅。”<sup>58</sup> 在政府政策的背後是外國和國內商人不止息的走私白銀出國外，讓通縮問題無法解決。在經濟危機和政策未能實施的情況下，國民政府開始面臨必須改革貨幣系統的逼切決策。在這個階段，杜月笙在上海黑白兩道的影響力就成了政府所須依賴的力量。

## 杜氏與法幣

就在國家發生金融危機之際，在“1935年2月13日，杜月笙召集上海市商會代表，銀行業公會，錢業公會代表進行會談。”<sup>59</sup> 會議的目的是如何扭轉當時的經濟狀態。到“3月初，孔祥熙到上海，與地方當局，杜月笙及銀行家多次召開會議，催逼上海銀行家擔起救濟責任。”<sup>60</sup> 孔祥熙代表國民政府提出要求“金融業承擔2,500萬元的公債以救濟市面。”<sup>61</sup> 其後銀行家們因“過份謹慎和保守”<sup>62</sup>，不願提供救援，孔祥熙“宣佈政府必須接管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sup>63</sup> 貨幣改革的目的是讓中央政府有着不需要白銀為儲備而發行鈔票的獨有權力。所以政府接管中國和交通兩大銀行是必須的步驟。在接管兩家大銀行的過程中，杜月笙扮演了與孔祥熙和國民政府合作的角色。根據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的一份報告，孔請了杜月笙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股東談判，是因為“這些股東和杜關係融洽，對他十分信任。”<sup>64</sup>

在“1935年9月，國民黨進行法幣改革，杜月笙成為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的委員之一。”<sup>65</sup> 當時英國派出了李滋。羅斯為中國貨幣改革的顧問。他對為何國民政府會讓一個黑幫頭目為貨幣改革過程的重要成員覺得很費解並“反對讓杜參加法幣改革事宜。”<sup>66</sup> 但是孔祥熙跟他解釋說：“在上海，杜的手下有十多萬人，聽從其命令，

---

<sup>58</sup>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1924-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991年)，頁142。

<sup>59</sup> 《新聞報》，1935年2月13日。

<sup>60</sup> 同注21，包樹芳：〈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頁111。

<sup>61</sup> 《申報》，1935年3月22日，頁9。

<sup>62</sup> (美)帕克斯.M.小科布爾著，蔡靜儀譯：《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頁101；轉引自白華山：〈杜月笙與上海市地方協會〉，《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卷2期(2003年3月)，頁66。

<sup>63</sup> 同注21，包樹芳：〈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頁111。

<sup>64</sup> 同注36，(澳)布賴恩·馬丁著，周育民等譯：《上海青幫》，頁213。

<sup>65</sup> 同注21，包樹芳：〈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頁111。

<sup>66</sup> 同上。



他隨時可以給你製造出騷亂來的。”<sup>67</sup> 杜在銀行界的地位和社會底層的影響力讓他成爲政府欲實行貨幣改革所不能缺少的，而同年的 10 月，杜月笙就成爲銀行公會理事。<sup>68</sup>

除了接管中，交兩大行以外，政府爲了推行貨幣改革亦需要重量級的私人銀行的配合和唯命是從。在杜月笙如何接管中國通商銀行的過程可以看到他如何用高明及狠辣的手段成功達到他和孔祥熙的目的。“中國通商銀行是中國首家（現代的）銀行，”<sup>69</sup> 而在“1926 年，（它）的資本額有 3,472,222 元，在它所屬的江浙財團中居於首位。”<sup>70</sup> 通商銀行的掌託人爲職業銀行家傅筱庵。傅和北洋軍閥的關係比較密切。在 1926 年，當時盤踞上海的孫傳芳曾在上海總商會會長選舉裏面出面支持傅筱庵。<sup>71</sup> 從此，孫傅二人就結下了深厚的友情。亦因如此他和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關係往往都是若即若離。

到貨幣改革的 1935 年，孔祥熙和杜月笙透過就“中國，交通二行祕密收集起大量中國通商銀行發行的鈔票。”<sup>72</sup> 與此同時，“杜的門生故友大量存款入中國通商銀行。”<sup>73</sup> 在金融危機的時期，杜孔二人就可以用手上的通商銀行鈔票同時兌換，讓它受不了擠兌的風潮。就在這時，杜氏成功得到銀行的股權和控制權並被“被指定爲董事長，傅筱庵任常務董事。”<sup>74</sup> 從此通商銀行成爲“官商合辦的四小行之一，作爲中央，中國，交通，農業四大銀行的衛星銀行。”<sup>75</sup> 杜月笙操控了董事局，他命令銀行“所有發行事宜，即遵令移交中行辦理，”<sup>76</sup> 這就意味着通商銀行“放棄了發行鈔票的特權。”<sup>77</sup>

當國家幾大發鈔的銀行機構都在中央政府和杜氏所控制的時候，貨幣改革的時機就成熟了。1935 年 11 月 4 日國民政府推行法幣政策，當中有 16 條，其中第一條最

---

<sup>67</sup> (美)帕克斯.M.小科布爾著，楊希孟、武蓮珍譯：《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 250；轉引自注 21，包樹芳：〈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頁 111。

<sup>68</sup> 同注 21，包樹芳：〈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頁 108。

<sup>69</sup> 同注 29，胡雪蓮：〈杜月笙與中國通商銀行〉，頁 59。

<sup>70</sup> 同上。

<sup>71</sup> 同上。

<sup>72</sup> 同注 29，胡雪蓮：〈杜月笙與中國通商銀行〉，頁 62。

<sup>73</sup> 同上。

<sup>74</sup> 《申報》，1935 年 6 月 8 日，頁 10。

<sup>75</sup> 同注 29，胡雪蓮：〈杜月笙與中國通商銀行〉，頁 62。

<sup>76</sup> 周開慶著，中國通商銀行編：《五十年來之中國經濟》(台灣：華文書局，1967 年)，頁 7。

<sup>77</sup> 同注 29，胡雪蓮：〈杜月笙與中國通商銀行〉，頁 63。

為重要：“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sup>78</sup>還有，人們“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sup>79</sup>從此只有中央政府可以發行鈔票並不用收白銀儲備所約束。中國的法幣是與英鎊和美元所掛鉤的，但與銀本位有所不同，因為匯率是可以浮動的。法幣政策實行後，孔氏和中央政府對銀行業的控制有所加強並用這個時機實行金融掠奪。1936年2月，孔祥熙在於上海銀行界的會議上提出延期償還公債的建議，“因為杜月笙，張嘯林兩人在座，所以會議就只好乖乖地接受了孔祥熙的計劃。”<sup>80</sup>由此可以看出孔氏是如何憑借黑幫的勢力來威逼銀行界。

杜月笙在法幣政策的作用極大，中央政府亦所以相應的給他名利兩方面的酬勞。貨幣改革後，“他被國民黨任命為中國銀行，中央銀行的董事。”<sup>81</sup>同時，杜憑着與政府的關係，在公債投機生意謀取了豐厚的利潤。“1937年（他所控制的銀行）的證券盈利達37.8萬元，佔全行整個盈利的四分之一。”<sup>82</sup>1936年杜氏的中匯銀行與浙江銀行合併。銀行內部承認“本行自合併實力較厚，規模粗具，又得各大銀行之聯絡，彼此聲氣互通互有存款往來，信譽既上，發展可期。”<sup>83</sup>靠着雄厚的資本和與社會所有階層的關係網，杜氏在上海的銀行界就有着無法代替的地位。反映着杜氏躊躇滿志的心理，在1936年他就說了這句話：“我原來是強盜扮的書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現在是蚺蟻修成了龍，在社會上有些地位了。”<sup>84</sup>

## 總結

民國時期的中國，中央政府的權力有限。在上海這個大都會，各國的租界林立，讓正常的公共治安政策無法進行。這個就給了像杜月笙這類的黑社會頭目帶來隻手遮天，權傾上海的契機。上海為當時中國的金融中心而因為政府的管制能力有缺陷，讓杜月笙有加入並發展他在金融業的機會。到1935年，杜氏就成為上海金融界的翹楚而

---

<sup>78</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人民銀行江蘇省分行、江蘇省金融誌編委會合編：《中華民國金融法規選編》（檔案出版社，1990年），頁401-403。

<sup>79</sup> 同上。

<sup>80</sup> 同注63，(美)帕克斯.M.小科布爾著，楊希孟、武蓮珍譯：《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頁242。

<sup>81</sup> 同注21，包樹芳：〈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頁111。

<sup>82</sup> 同注63，(美)帕克斯.M.小科布爾著，楊希孟、武蓮珍譯：《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頁250。

<sup>83</sup> 《中匯銀行董事會股東會議事錄·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七日股東會》，上海檔案館館藏檔案，Q285-01-00001；轉引自注21，包樹芳：〈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頁107。

<sup>84</sup> 黃炳權：〈杜月笙出任上海麵粉交易所理事長的經過〉，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4輯，舊上海的幫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99。

金融危機又讓政府有貨幣改革的必要。爲了進行改革，中央政府依賴者杜氏的關係網和法律以外的影響力，從而成功的推行了法幣制度。當時，國外的顧問如李滋。羅斯會因爲杜氏在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驚訝和愕然。不管如何，孔祥熙是意識到杜氏的勢力並充分運用它來達到貨幣改革的目的。杜氏亦在當時完全配合中央政府而且因爲其在改革過程中的功勞而得到名譽和利益的收穫。

1935 年的法幣政策的影響深遠。因爲中國在改革過程中不讓日本有領導地位，領到中日關係惡化。這件事與 1937 年日本全面侵華有一定的關係。抗戰開始，政府花了鉅款抵禦敵人並造成赤字。政府因爲沒有銀本位的約束而大量印刷法幣而引至嚴重的通貨膨脹。抗戰的 8 年間，“法幣發行額從 14.1 億元增加到 5569 億元，增發指數 394.84。”<sup>85</sup> 物價指數在同期上升 1600 倍。<sup>86</sup> 抗戰後的內戰期間，通脹的問題一直未能解決。“1949 年 4 月商品價格較 1946 年 12 月上漲了 5400 多萬倍。”<sup>87</sup> 大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對此有以下的看法：“長期赤字財政所帶來的國力衰弱的後果，是中國後來惡性通脹的主要因素。”<sup>88</sup> 法幣的大量發行帶來經濟混亂並成爲國民黨丟失大陸的重要原因。

---

<sup>85</sup> 洪葭管：《中國金融通史(第四卷)：國民政府時期(1927-1949)》(中國金融出版社，2008 年)，頁 465；轉引自注 40，周子衡：〈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對中國貨幣經濟的沖擊〉，頁 40；楊培新：《舊中國的通貨膨脹》(北京：三聯書店，1963 年)，頁 24。

<sup>86</sup> 同注 40，周子衡：〈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對中國貨幣經濟的沖擊〉，頁 40。

<sup>87</sup> 同注 40，周子衡：〈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對中國貨幣經濟的沖擊〉，頁 41。

<sup>88</sup> 同注 40，周子衡：〈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對中國貨幣經濟的沖擊〉，頁 40。

## 參考資料

### 甲、報章 / 檔案

《申報》，1935年3月22日。

《申報》，1935年6月8日。

《新聞報》，1935年2月13日。

《中匯銀行董事會股東會議事錄·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七日股東會》，上海檔案館館藏檔案，Q285-01-00001。

### 乙、文章

白華山：〈杜月笙與上海市地方協會〉，《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卷2期(2003年3月)，頁64-70。

朱華、蘇智良，〈杜月笙其人〉，《歷史研究》，1988年2期，頁102-115。

宋斐如：〈世界經濟現狀及其將來〉，《東方雜誌》，31卷11期(1934年6月)，頁17-32。

包樹芳：〈杜月笙與上海銀行家〉，《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3期，頁106-112。

周子衡：〈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對中國貨幣經濟的沖擊—1933-1948年中國貨幣經濟的現代轉型、失敗及其遺產〉，《金融評論》，2012年4期，頁30-45。

胡雪蓮：〈杜月笙與中國通商銀行〉，《中山大學研究學刊(社會科學版)》，20卷4期(1999年)，頁58-66。

惲逸群：〈杜月笙論〉，載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惲逸群文集》編選組編：《惲逸群文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59-173。

管漢暉：〈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的中國宏觀經濟〉，《經濟研究》2007年2期，頁16-26。

### 乙、書籍

Barrett, Ward. "World bullion flows, 1450-1800." In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 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 - 1750*,

edited by James D. Tracy, 224-25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社會問題組：《大流氓杜月笙》（北京：群眾出版社，1965年）。

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第5冊，經濟金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1924-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991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4輯，舊上海的幫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人民銀行江蘇省分行、江蘇省金融誌編委會合編：《中華民國金融法規選編》（檔案出版社，1990年）。

(澳)布賴恩·馬丁著，周育民等譯：《上海青幫》（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

(美)帕克斯.M.小科布爾著，楊希孟、武蓮珍譯：《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美)帕克斯.M.小科布爾著，蔡靜儀譯：《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

胡訓珉、賀建：《上海幫會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洪葭管：《中國金融通史(第四卷)：國民政府時期(1927-1949)》（中國金融出版社，2008年）。

周開慶著，中國通商銀行編：《五十年來之中國經濟》（台灣：華文書局，1967年）。

章君毅著，陸京士校訂：《杜月笙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1969年）。

(法)梅朋·傅立德，倪靜蘭譯：《上海法租界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

楊培新：《舊中國的通貨膨脹》（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